

震 、夫与故事：中国近古社会文化中的叙事

高小康〇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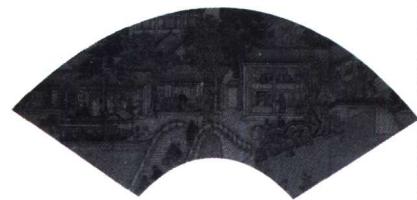
人
文
社
会
学
院
出
版
社



市民·士人与故事：中国近古社会文化中的叙事

高小康◎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戴联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民、士人与故事：中国近古社会文化中的叙事/高小康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ISBN 7-01-003292-0

I . 市…

II . 高…

III .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②文学—关系—社会生活—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 1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8701 号

**市民、士人与故事：中国近古社会
文化中的叙事**

SHIMIN、SHIREN YU GUSHI: ZHONGGUO JINGU
SHEHUI WENHUA ZHONG DE XUSHI

高小康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2 月第 2 版 2001 年 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0.25

字数：242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 7-01-003292-0/K·659 定价：19.00 元

“随园薪积”丛书总序

随园，是清乾隆时期著名文学家袁枚的故居。我们南京师范大学，恰好座落在随园旧址大略所在的那一片山丘及其附近的旷地。校区内古木参天，芳草茵地，鸣禽时变，檐翼欲飞，风景之清幽美丽，俨然是一座道地的南国园林。因此，许多年来人们习惯上也将南师校园称作“随园”。

我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 1981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全国

首批博士学位点和硕士学位点之一，又是我院“博士后流动站”和“国家文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心”的骨干学科，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项目“中国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化”的带头学科。本学科教师的教学和研究方向，涵括古代文学、文献学、古代文论等各个门类，从先秦直至晚清等各个时代，诗文、词曲、戏剧、小说等各种文体，覆盖面甚广。其中唐代文史研究、词学研究、明清小说研究等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较大的影响。

建国以来，本学科曾经拥有唐圭璋、孙望、段熙仲、诸祖耿、吴调公等著名学者，出版过《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元次山年谱》、《水经注疏校点》、《战国策集注汇考》、《李商隐研究》等高质量的著述。他们不仅以自己严谨的学风、精深的知识为本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亲手培养了几代教学与科研人才，催生了一批又一批新的教学与科研成果，诚所谓“新笋已成堂前竹，落

花都入燕巢泥”。

为了不断地向学术界介绍我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增加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积累,我们决定精选本学科教师在古代文学之文献与理论研究方面的优秀著作,编为这套《随园薪积》丛书。所谓“薪积”也者,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有取于《史记·汲郑列传》“积薪”而“后来者居上”之喻,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不断提高学术品位,提高学术价值。

第二,有取于《庄子·养生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之喻。教师是“薪”,学术是“火”,“薪”尽而“火”传。我们的物质生命不免于毁灭,但精神的生命却可望凭藉学术著作的流传而达到永恒。有冀于此,我们期待本学科的同仁将自己的“随园魂”融入这套丛书,使她真正成为我们精神生命的累积!

“随园薪积”丛书编委会

序

在中国文学史长河中，人们向来以为叙事文学的产生迟于抒情文学。但如就叙事活动而言，却并不滞后。法国学者罗兰·巴特在《叙事文的结构主义分析导论》中认为自人类发明语言以来就伴生着叙事活动。美国学者浦安迪也认为叙事活动与人类历史密切相关。他在《走向一种中国叙事的批评理论》中说：“任何对中国叙事之性质的探原，其出发点必须承认历史编纂学以及某种意义上的文化大成中的‘历史主义’的巨大重要性。”在《中国叙事学》中，他还认为中国的叙事文学可以上溯到《尚书》，大盛于《左传》。何况，在我国古代的抒情文学中也存在着叙事成分，如“诗史”说即是。可见在我国，叙事功能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同时其覆盖面因为不仅仅局限于通常意义上的文学样式，而是十分广泛地涵盖了各种文体，只不过我们对它缺少研究而已。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自从法国学者茨维坦·托多洛夫在 1969 年提出“叙事学”这一概念以来，这一门学科的历史也不过三十余年。在我国，从八十年代起就有一些学人对这门学科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力图结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以构建和描绘中国叙事学的框架与蓝图。

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小康君以《中国近古叙事艺术研究》为题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如今又充实、修订成专著《中国近古社会文化与叙事》出版。审视他所提交研究成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必将有助于中国叙事学研究深化。在既往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

评史的一些著作中,对于近古叙事文学也即宋元以来的话本小说、杂剧传奇作品多有评述,对于小说、戏曲理论也不乏绍介,但却存在着将创作与理论分别进行考察的割离现象,又少有从叙事功能角度进行深入探讨的论著。小康此作不仅沟通了创作实践、理论批评与接受活动三者的紧密关系,而且还描述了它们的发展流变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演进之间的互动状况;不仅对中国叙事文学中一些固有观念给出新的诠释,而且还对中国叙事艺术尤其是近古叙事艺术的发展演变作出新的扫描;既有理论上的宏观探索,又有创作上的微观透析,因此既没有天马行空的疏阔,又避免坐井观天的局促,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且有厚重之感,应该说这是一部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当然,它的学术价值须要待以时日,由广大研究者和读者来评论。正如法国著名的记者和小说家菲力克思·达文在为巴尔扎克《十九世纪风俗研究》作序时所说:“因为有见识的人的无记名投票(通过这种投票你的声名才能受到推崇)是一张一张地投来的。”

小康君在八十年代师从吴调公先生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硕士学位。调公先生为学界前辈,我经常登门向他请教,他亦不时光临舍间谈学,相处甚洽。调公先生所指导的几届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生,都邀我参加他们的论文答辩。1987年夏,高小康等三位研究生进行论文答辩,审读三君论文各有所长,小康君《论金圣叹小说美学》予我以深刻印象。论文在全面评述金圣叹著述的基础上专就其小说美学作深入研究,并且在与王守仁、李卓吾乃至黑格尔的人性、性格说的比较中突显出金圣叹的人性论特点。这篇论文使我了解到小康的学问与识见。因此,当调公先生年老力衰、无力再从事教学时,小康希望投入我的门下继续深造。感其陈请恳至,知其才识踔绝,我方勉力接纳。三年后,小康以其厚重的博士学位论文进行答辩,颇获专家好评。小康现已增补为博士生导师,应该

说，这是与此前在调公先生精心指导下打好扎实功底分不开的。

小康此书即将出版，嘱我为序。我答之以如调公先生健在，此序当请调公先生撰写为宜。小康答曰：“调公老师在，当请两位老师写；如今调公老师已归道山，只能请美林老师写了。”言之不胜怆然。今小康书成，当可告慰调公先生于地下。我相信以小康的绩学有素，新著将不断问世，当拭目以待其大成。

陈美林
2000年7月于清涼山畔

目 录

“随园薪积”丛书总序 (1)

序	陈美林(1)
导论：中国叙事观念的演变	(1)
一、从历史到叙事	(2)
二、从道德意识到悲剧精神	(8)
三、从即兴讲唱到案头文本	(14)

上 编

第一章 通俗叙事艺术与市民文化的新地位	(23)
一、叙事中世界的变迁	(23)
二、市民文学中的市民地位	(28)
三、市民形象的演变	(37)
第二章 市民文学中的士人趣味	(44)
一、凌濛初与士人的二重性	(44)
二、从市民的兴趣到士人的兴趣	(48)
三、士人气与市民气的交融	(54)
四、士人道德与市民道德	(61)
第三章 文人叙事中的士人梦	(65)
一、传统社会关系中的士人	(66)

二、进入市井社会的士人形象	(72)
三、才子佳人与士人中心的幻想	(76)
四、才子梦及其幻灭	(84)
第四章 士人与市民地位的倒易	(91)
一、士人的尴尬处境	(91)
二、士人与市民的倒易	(102)
三、士人在叙事中的退席	(110)

中 编

第五章 从《金瓶梅》看叙事意图的演变	(116)
一、在暧昧的叙事意图背后	(116)
二、叙事结构与世界秩序的分裂	(121)
三、性格与视角的矛盾	(127)
第六章 从《桃花扇》看悲剧精神的形成	(135)
一、中国古典叙事中的悲剧	(136)
二、走向悲观主义	(138)
三、历史/哲学主体悲剧的产生	(146)
四、情境悲剧与悲剧的典雅化	(151)
第七章 金圣叹与叙事作品评点	(157)
一、金圣叹批评理论的文化背景	(158)
二、叙事艺术的美学性质	(180)
三、人物性格理论的成熟	(198)
四、“文法”理论的发展	(210)
第八章 李渔与戏曲叙事理论	(226)
一、结构第一：戏曲叙事的新观念	(227)
二、机趣与性灵	(236)
三、演出与戏曲的商业性	(241)

第九章 王国维与悲剧理论的蜕变	(247)
一、《红楼梦评论》：传统的悖离	(247)
二、痛苦与解脱	(249)
三、传统文化精神的衰颓	(255)

下 编

第十章 精神分裂的时代	(265)
一、“心”的困扰	(265)
二、君子与小人	(269)
三、雅俗的淆乱	(273)
四、自娱与自虐	(277)
第十一章 明清之际文艺思潮的转折	(280)
一、“如剥春笋”的复古思潮	(280)
二、走向悲观主义	(283)
三、艺术自律观的产生	(288)
第十二章 清代的文人与文学	(296)
一、心学与清代士气的凋落	(296)
二、盛世的凄风苦雨	(303)
三、末世的剑气箫声	(308)
主要引用书目	(315)

导论：中国叙事观念的演变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叙事”即讲故事的活动都是整个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它在传统的继承和社会性格引导方面往往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叙事艺术因而也就成为一个民族的艺术文化中至关重要的部分。然而当人们把中国的文学传统与外国尤其是西方文学传统加以比较时，一个一眼便可以看出的差别就是，中国的叙事艺术传统似乎比许多民族的传统尤其是以希腊、罗马文化为源头的西方传统要弱得多。在中国，成熟的叙事艺术如史诗式的长篇叙事文学、具有完整情节的戏剧都出现得很晚。这当然不能证明中国早期没有叙事艺术传统。事实上，中国早期的叙事传统是以更加理性、更加实用的“史”的形式发展的，因而作为想象和虚构的艺术的叙事文学的发展则相对滞后了。

中国的叙事艺术真正有了重大发展的时期是宋元以后的近古时期，最重要的标志是自元杂剧以来走向成熟的戏剧叙事和元末明初从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白话小说。按照传统的文艺观念，戏曲与白话小说都属于通俗文艺的范畴，这类叙事艺术的发展当然与宋元以来市民文化的发展分不开，这是许多学者注意到的一个基本事实。然而，这样一个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的结论远不足以使我们对中国叙事艺术传统的形成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有更为深入的认识。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这一艺术传统从哪里发生，更重要的是它是如何发生的。下面所要探讨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

即近古叙事艺术的观念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

一、从历史到叙事

中国汉文化传统的早期历史中,从来没有产生过像《伊利昂纪》或《出埃及记》那样的史诗性的叙事文学作品。有人把《诗经》中的《生民》、《公刘》等篇章当作史诗,即使这样算,这些“史诗”在规模、气势与想象力方面毕竟很难与世界文化史上的那些著名史诗相比。事实上,《生民》、《公刘》这样的作品更近于纪实的“史”而非“史诗”。中国早期的叙事艺术一直是依附着历史写作发展的,尽管在《左传》、《史记》等优秀的历史著作中不乏精彩的叙事成分,但从总体上说,它们属于历史而不是小说、戏剧等经典意义上的叙事艺术。

历史著作中的叙事与经典意义上的叙事艺术,二者之间最明显的差别就在于叙事内容的不同。简单地说,历史著作所讲述的是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真实事件,而小说、戏剧等叙事艺术所讲述的则是虚构的故事,即所谓“虚”与“实”的差别。如果从先秦时期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算起,经过魏晋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宋元话本中的“银字儿”直到明清的《今古奇观》、《拍案惊奇》之类的拟话本小说,确实可以看出小说与历史著作在“虚”与“实”方面的明显不同,这就是明人所说的“怪怪奇奇”——小说的内容即使不是荒诞不经的海外奇谈,至少也是耸人听闻的奇闻轶事。但是,这种以虚实划分历史著作与叙事艺术的办法并不总是靠得住的。我们观察《三国演义》之类的历史题材小说时,就会发现遇到了麻烦:大多数历史演义的内容是有所本的,主要的故事情节通常都是取自历史著作。这样一来,历史小说与正史的区别问题便被提了出来,这就是自明代以来小说批评中常常提到的历史演义小说内容的虚

实关系问题。在人们看来,历史与小说在内容上的差别主要是事件本身是否发生过的问题,历史演义小说的问题在于混淆了这两类文体的差别,所以引起了许多争论。按照这种观点,似乎历史演义不过是历史著作与小说的混合形态,如人们在批评《三国演义》时所说的“七实三虚”之类。

然而用这种简单的“虚实”观来区别小说与历史,很容易使我们对叙事艺术的认识产生混乱。比如,把古典小说中的两部经典作品《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同历史著作加以比较,很自然地就会得出《三国演义》更接近于历史著作而不是《水浒传》一类的小说这样一个结论,显然这将使我们从叙事内容上区分历史与小说时遇到很大的困难。

从宋元时期的话本来看,历史小说的雏形——被称作“讲史”的平话,主要内容确乎是从正史与野史中截取下来的。从今存的《全相平话五种》中所保存的话本内容来看,大体上是以正史为纲,杂以稗史野闻联缀而成,认真考究起来,确乎像是虚构与实录的大杂烩。这些早期的讲史平话语本从艺术上讲,当然还是很稚拙的。尽管如此,这些话本毕竟已经成为叙事艺术的作品,它们与历史著作的区别已不仅仅是“虚”与“实”的比例关系这样的量上的差异,更在观念上开始产生了实质性的区别。

试举一个比较重要的平话——《三国志平话》为例,这篇平话的基本内容是来自陈寿的历史著作《三国志》,当然进行了语言方面的通俗化的加工,并对内容作了增删,特别是增加了许多传奇性的情节。然而,这些加工工作还不足以使一部讲史平话与历史著作从本质上区分开来,充其量只能说是把历史变得通俗化了。但重要的是,在这种加工工作中,渗入了一种不同于历史著作写作的新的观念。《三国志》的内容应当说已经具有了相当生动的故事性,但它的纪传体格式使得叙事内容被打乱分割成碎片,因此无法

形成完整的史诗规模的叙事情节；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中的三国史实则已组织成了系统的故事。尽管如此，作为历史著作的《通鉴纪事本末》中的三国故事与讲史平话中的三国故事在根本的叙事观念上就有着重要的差别。在《通鉴纪事本末》中，三国故事的内容大体上是从第八卷的《宦官亡汉》开始，到第十一卷的《魏灭蜀》或《晋灭吴》为止。这正是《全相三国志平话》乃至后来的《三国演义》所叙述的整个三国故事的轮廓。《通鉴纪事本末》是怎样解释这一整系列历史故事的呢？我们先看看故事的开头：

汉和帝永元四年，窦宪兄弟专权，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宪，独中常侍钩盾令郑众不事豪党，遂与定议诛宪。^①

这里所讲的宦官议政的事，正是后来宦官专权而导致天下大乱乃至三国鼎立的滥觞。因此，这段史实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三国故事的开端。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宦官亡汉》的故事又不能算作真正的开端。就在上引《通鉴纪事本末》“遂与定议诛宪”后面有一行小字夹注说：“事见《窦氏专恣》”。这就是说，《宦官亡汉》既是三国故事的开端，也是该书中此前第六卷记载的“窦氏专恣”一事的后果。而在这部书的第十一卷中《魏灭蜀》一章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

会帝问给事中樊建以诸葛亮之治蜀，曰：“吾独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邓艾之冤而不能直，虽得亮，得无如冯唐之言乎？”帝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艾孙朗为郎中。

^①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八《宦官亡汉》，中华书局1986年重排本。

这段对话是在魏灭蜀之后，可以说也差不多是在三国故事结束后发生的。这段话的意义在于，它把三国故事与三国以后的历史联系了起来。事实上，书中第十一卷从《魏灭蜀》之后，接下来《淮南三叛》、《司马氏篡魏》、《晋灭吴》、《羌胡之叛》、《陈敏之叛》直到第十二卷的《西晋之乱》，这一系列叙述中没有任何中断的痕迹，便从三国故事引到后面的历史叙述。

总之，从《通鉴纪事本末》中所叙述的三国故事来看，在历史著作中的叙事，无论是小小的片断还是一个长长的系列，不管故事本身写得怎样精彩，从观念上来讲都从属于整个历史过程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故事。

我们再来看看作为叙事艺术的历史故事《全相三国志平话》，尽管从讲述的内容以及叙事写作的艺术来讲还是很粗浅的，但在叙事观念上已有了与历史著作不同的特点。平话的开端是这样的：

江东吴土蜀地川，曹操英勇占中原。不是三人分天下，来报高祖斩首冤。

昔日南阳邓州白水村刘秀，字文叔，帝号为汉光武皇帝……光武帝急令：“传寡人圣旨，来日是三月三日清明节，假□□黄榜，寡人共黎民一处赏花。”

至次日，百姓都在御园内赏花，各占亭馆。忽有一书生，白襕角带，纱帽乌靴；左手携酒一壶，右手将着瓦钵一副，背着琴剑书箱，来御园中游赏……这秀才姓甚名谁？复姓司马，字仲相……

这是加在故事正文前面的楔子，讲的是汉光武帝时一名叫司马仲

相的书生为阴司断狱的故事。故事将汉高祖和他所杀害的功臣投胎到汉末转世为三国时人，以偿报汉高祖杀害功臣的罪愆。这段故事另出现在冯梦龙编的《喻世明言》第三十一卷“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中，不过书生的名字改成了司马貌（字重湘，与“仲相”同音），断狱的时间也由光武帝时改到了灵帝时。与《喻世明言》相比，《三国志平话》中的书生断狱故事要稚拙得多，开始没头没脑，结尾不明不白，而且与后面开讲的汉灵帝时期的故事之间有一大段时间的空缺。尽管如此，这段楔子仍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由于这段故事与后面的正文在时间和情节关系上都不相连属，它变成了三国故事前面的一个帽子，把三国故事与三国之前的历史分割开来。在陈寿的《三国志》中，三国故事是此前历史的延伸；而在《三国志平话》中，三国故事是一个荒诞不经的轮回报应过程的展开，它的开端不是在时空关系上直接相关的前一段历史中，而是在遥远的过去，在一个不相干的小人物身上。

《三国志平话》的结尾是这样的：

却说汉王领军数十万，前至洛阳伐晋。晋怀帝出迎敌阵，败，汉兵执之，杀而祭于刘禅之庙。又有晋愍帝即位于长安。汉王遣刘曜征之，遂虏晋愍帝，遂纳晋惠帝美皇后为妻，遂送晋帝于平阳郡。汉王遂灭晋国，即汉皇帝位，遂朝汉高祖庙，又汉文帝庙，汉光武庙，汉昭烈皇帝庙，汉怀帝刘禅庙而祭之，大赦天下。

汉君懦弱曹吴霸，昭烈英雄蜀帝都。司马仲达平三国，刘渊兴汉巩皇图。

结尾的这首下场诗与开始的那首上场诗遥相呼应，把整个故事笼罩起来。故事的最后特意用刘聪灭晋的事作结，并让刘聪把晋怀